

· 史论 ·

##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

李 颖

**[摘要]**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与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主体的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下,国民党进行改组,国共实行党内合作。其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功不可没,这体现在武器装备的提供、政治工作的开展、北伐战略方针的制定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 大革命时期 共产国际 中国国民党

作为世界共产党联合组织的共产国际,领导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的理论思想、方针政策、革命模式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中国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主体的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更是非常的密切,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简单梳理。

### 一、共产国际的“东方路线”

1920年,苏维埃俄国在彻底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叛乱后,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先后遭到失败,资本主义世界逐渐摆脱战后出现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混乱状态,开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面对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苏维埃俄国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建设和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新任务。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的对外政策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阶段结束和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的情况下形成的。此外,俄共(布)已经成为执政党,它在4年多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过程中,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巩固政权上。

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对外政策是第二位的问题。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要求调整在内战时期中断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协

调同邻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现实生活要求从指望进行世界革命时期的革命外交,即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范围内用各国革命人民团结一致的关系取代旧外交,过渡到国家间的正常关系。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只是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从前,世界革命的思想是以用在外部直接支持下的革命人民力量来立即推翻统治制度的指导方针来体现的。当前则变成了主张在调整同各国政府的通常外交关系的前提下,组织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这种指导方针导致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使解决同西方和东方国家各种政治经济关系问题大大复杂化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西方战略遭遇挫折。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其战略重点在欧洲。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1918年1月爆发了芬兰革命,9月保加利亚的弗拉戴士兵起义,11月又发生了德国十一月革命。欧洲似乎真的出现了“全欧洲的革命”的前景。但是,形势很快逆转,欧洲各国的革命风暴相继被平息。

由于一系列尝试的失败,以及立即在西方国家首先是在欧洲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的破灭,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开始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东方,采取并制定世界革命“东方路线”的最初步骤,积极在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寻找伙伴和盟友,组织能够在俄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并与其联合的情况下参加反帝斗争的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迅速发展的东方各国民族工业立即重新受到沉重的压迫,从而激化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压迫还激化了其与农民、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使他们逐渐在反对外来压迫方面统一起来。这些构成共产国际“东方路线”的社会基础。

随着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和白卫军在远东遭到失败,以及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产生了苏俄同中国国内革命力量进行直接接触的条件。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出现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团体,其中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包括对苏俄的经验,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此后,东方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问题,逐渐成为共产国际注意的中心。共产国际二大专门研究了东方问题,通过对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1920年8月,为了解中国情况,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委派了常驻代表马林。

在共产国际第三至第五次代表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及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对东方问题及中国问题都作了一些探讨。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底承认,共产国际“确实对中国的解放运动和解放斗争有极大的兴趣并特别关注”<sup>①</sup>。

## 二、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

早在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就提出:在绝对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sup>②</sup>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究竟哪些力量是革命的民主派,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共产国际与苏俄的认识都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不断地派出使者到中国寻找同盟者。但在最初,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实行的是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疏远孙中山的政策。

事与愿违,共产国际与吴佩孚、陈炯明结盟的意图很快成为泡影。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叛变革命,他的名字从共产国际可以

结盟的候选人名单中被勾掉。而在北方实行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在1921年下半年也遇到困难:北京政府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优林使团坚持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权益,而且苏俄红军未经北京政府的同意就开进外蒙,驻兵库伦,使双方关系不断恶化。1923年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中国工人阶级的鲜血使共产国际认识到,吴佩孚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极端反动的军阀刽子手。至此,经过曲折的过程和血的代价,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才得以改变,转而开始重视并最终采纳马林的建议,全力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

其实,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对国民党本身的涣散是认识不足的,也无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而是热衷于北伐,希望用武力消灭北洋军阀,并且幻想英、美政府能够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以支持其北伐事业的完成。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曾先后派代表来中国与孙中山接触。由陈独秀介绍,1921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着翻译张太雷,经过湖南,前去广西桂林拜访孙中山。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在谈到承认俄国与联俄的可能性时,孙中山认为,在北伐还未完成前,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过早地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涉。马林则认为,国民党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必然会导致这种干涉,劝说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但马林当时并未说服孙中山,孙中山只是表示“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sup>③</sup>。

会见孙中山后,马林又到广州等地考察,通过与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对国民党颇有好感,认为孙中山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民党的党纲使得“各种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进去”。基于这种认识,马林回到上海后,便向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建议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放弃独立”。<sup>④</sup>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③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1页。

④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17、21页。

马林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立即遭到陈独秀的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阐述自己反对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遭陈独秀拒绝后,于4月24日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7月11日,他提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再次提出中共应采取加入国民党的途径实现同国民党的合作。共产国际很快采纳马林的建议,要求共产党人支持国民党。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于8月回到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刚刚闭幕,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这样,就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但是,共产党此时提出的与国民党的联合方式,是一种两党并行的外部联合。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也是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是促使孙中山痛下改组国民党决心的一个契机。他没料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深感国民党内部成分过于复杂,“人格太不齐”,初生改组国民党之意。这时,英、美帝国主义却落井下石,逼迫孙中山避难所乘的军舰离开白鹅潭。在孙中山处于一生中最艰难困苦之际,共产国际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给孙中山以宝贵的支持和援助。

马林携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到上海。8月25日,在李大钊陪同下,马林在上海法国租界再次会见孙中山,双方商谈了改组国民党、联合苏俄,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问题。马林告知孙中山,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同时,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并建议孙中山“要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sup>①</sup>经过马林等人的艰苦工作,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同意和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 三、共产国际协助改组国民党

中共三大后,国民党的改组步伐加快了。由于孙中山提出改组的方法是“以俄为师”,“要学俄

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所以在整个改组尤其是改组文件和党纲制定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俄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任命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莫斯科给越飞两项使命:一是与北京政府商谈有关外交、商务关系等问题,二是与孙中山秘密商谈双方合作问题。越飞来华后,虽然同北京政府的建交谈判进展迟缓,但与孙中山的秘密接触却取得重大进展。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双方谈到中俄两国国内国际各种问题。经过马林、张继等人多方努力,终于促成孙中山与越飞的首次会晤。1923年1月26日,他们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发表《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在宣言中,苏联重申放弃在华特权,声明对外蒙古无领土野心,双方表示以谅解精神解决中东铁路问题,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宣言指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sup>②</sup>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化。这无论对孙中山本人还是其领导的国民党来说,意义都是空前的。此后,孙中山高举联俄旗帜,从改组国民党起步,开创了国民革命运动新局面。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赞同越飞的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采纳马林和维经斯基修改意见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全面表述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国共合作问题的观点,指出:中国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尽管决议再度强调,共产党人要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建立强大

<sup>①</sup>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8—29页。

<sup>②</sup>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

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并称这是“重要而特殊的任务”。但是,决议又特别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以便“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sup>①</sup>

共产国际作出此决议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其中包括外交方面的原因。因为苏联驻北京的代表在两年中未能从中国政府方面争取到建立正式关系、解决外蒙古地位、苏联军队驻留外蒙古领土及中东铁路等一系列问题。而苏联认为,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讲,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1923年3月,苏联政府决定向孙中山提供近200万墨西哥元的财政援助,并答应孙中山的请求,决定派遣顾问到中国。

6月,中共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但由于国民党人的不合作,中共三大有关国共合作的决议实际上“还是一纸空文”<sup>②</sup>。据张国焘回忆,他在11月初“收到陈独秀同志本人的来信,说他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张国焘说:“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而且,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而是现实状况造成的。”<sup>③</sup>张国焘所说的“现实状况”便是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实施改组行动。

只是到了这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sup>④</sup>在加拉罕写给孙中山的介绍信中,称鲍罗廷是苏联政府代表,同时又是加拉罕的私人代表。

鲍罗廷于10月到达广州。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借重他的经验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说:“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sup>⑤</sup>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态度,孙中山不断委托鲍罗廷办理有关改组的重大事宜,如向改组会议作报告,提出改组任

务;起草国民党的组织法、党章、党纲、一大宣言;前往上海,向上海执行部报告国民党改组的纲领草案,征求修改意见,等等。

加拉罕和鲍罗廷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所遵循的总的思想政治原则是共产国际1923年1月12日决议和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

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传到上海鲍罗廷手中时,已是12月30日。鲍罗廷说:“看来,我的全部工作都符合这些提纲的精神”,但他同时承认,也许“并没有立即掌握这个调子”。<sup>⑥</sup>该决议指出: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没有把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党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而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因此决议最后指出:“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sup>⑦</sup>

共产国际经过不同渠道、通过各种方式向孙中山及国民党领导人反复申明以上思想观点。在制定国民党一大宣言过程中,鲍罗廷据理力争,坚持“必须把农民和工人吸收到争取中国统一与解放的斗争中来,否则革命就会失败”。<sup>⑧</sup>最后,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方案,尽管鲍罗廷对文件还是不甚满意,但用他的话说,至少把空洞的措词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关于如何解释中国革命发展新阶段的三民主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6—77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69页。

③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张国焘给威金斯、穆辛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8页。

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6页。

⑤ 《孙中山选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

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94页。

⑦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81、83页。

⑧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义的内容,共产国际在11月28日决议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民族主义,应当解释为“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民生主义,应当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但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sup>①</sup> 以此为依据,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制定了在当时条件下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革命纲领,完成了国民党改组过程中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鲍罗廷指出,共产国际提纲中涉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条款能否实现,“决定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的工作积极程度和其影响加强的程度”。鲍罗廷认为,迄今为止,他“正是这样做的”。<sup>②</sup>

在共产国际、鲍罗廷、陈独秀和其他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孙中山力排众议,坚持改组国民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共产国际代表给予国民党一大以极高的评价。对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一大的召开起了决定作用的鲍罗廷说:这次会议“开辟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新纪元”,<sup>③</sup>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才开始作为一个政党,作为国内的一支政治力量而存在”。<sup>④</sup> 加拉罕称:国民党一大“不仅是党的历史上而且也是国民革命运动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为国民革命组织,为它的战斗核心奠定了基石”。<sup>⑤</sup>

#### 四、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流产

1924年8月底,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会,讨论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问题。

在全会召开之前,围绕共产党员的问题就已经议论纷纷。右派出版反对共产党的专刊,举行了一些会议。他们视共产党员为敌人,要求把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甚至还出现了右派与共产党员进行理论论战的文章。据鲍罗廷说,建立一个直属国民党中央政治局<sup>⑥</sup>的国际联络委员会的

建议,是国民党中央派提出来的,目的是“让国民党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它能知道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能经常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甚至不用探听共产党的‘秘密’,国民党就可以知道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态度”,并且“这样的组织也可以同共产国际进行谈判以彻底解决问题”。<sup>⑦</sup> 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后召开的一次中共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建立国际联络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派很早的想法,是由孙逸仙博士在会前直接提出来的”,“成立这个机构的原因和目的(即解决两党关系问题,包括消除似乎在国民党内正在建立共产党支部的怀疑),是国民党代表(汪精卫)、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同志)和中共非正式代表(瞿秋白同志)之间谈论的话题,并且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达成了协议”。<sup>⑧</sup>

《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提交给全会讨论,结果以9票(即全票)通过。其中最后一条,即第四条就是关于国际联络委员会的问题:“因本党之外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内之共产主义者有从事‘支部活动’之嫌,故中央政治局下设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sup>⑨</sup>看来,所谓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只限于弄清楚所谓“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而不是中派所期望的经常从莫斯科得到指示并凌驾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之上的一个特殊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81—82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395页。

③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19页。

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10页。

⑥ 指成立于1924年7月11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其成员有:孙中山(主席)、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为瞿秋白)、伍朝枢和邵元冲,鲍罗廷被聘为高级顾问。在鲍罗廷的报告中称该委员会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

⑦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21页。

⑧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33页。

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23页。

组织。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国民党没有任何必要干涉独立的共产党的事务，国际联络委员会的任务是，应与共产国际一起进一步弄清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

得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决议精神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极其气愤。他立即于9月7日写信给维经斯基，阐述自己对会议决议和鲍罗廷的极大不满，称“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陈独秀尤其对成立所谓“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表示强烈抗议，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说，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与此相反，鲍罗廷不是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上述行为，却建议成立所谓的国际联络委员会。陈独秀认为鲍罗廷是“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他请维经斯基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sup>①</sup>

10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批评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二次全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共党员瞿秋白“未看清这个实际情况，也未反击右派，抵制他们试图把共产党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做法，因此“落入了中派设置的圈套”。关于所谓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一事，会议决议特别指出：“鲍罗廷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在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默认了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问题的决议案的第四条，并让它通过了。中共中央执委会认为，这等于共产国际和中共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这一条将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干涉共产党活动的依据。”<sup>②</sup>

10月10日，陈独秀再次致信共产国际远东部，指责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二次全会的鲍罗廷和瞿秋白“对中派作出的让步太多，对自己的观点捍卫太差”<sup>③</sup>。

维经斯基对国际联络委员会的理解更显得与众不同。他说，这个国际联络委员会设在广州，

“由国民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组成”，“不具有国际性质，也就是说它不直接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不（在亚太范围内）进行国际性工作，而将渐渐成为调解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人之间某些冲突或误解的机构”。<sup>④</sup>

在以后的时间里，未见有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活动，国际联络委员会之事不了了之。

## 五、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北伐本是孙中山的遗嘱。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华的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是积极支持的。早在1925年东征军占领汕头后，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加伦就开始筹划北伐问题，并在9月的《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中，正式提出北伐的计划。但是，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最初是不赞成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的。

1925年12月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加强了对北伐的谴责”，决定接受斯大林提出的指示，即“认为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sup>⑤</sup>拉斯科尔尼科夫在12月4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对斯大林的观点进行了阐述。

起初，鲍罗廷对北伐也持反对态度。他在1926年2月的布勃诺夫使团会议上讲：“我至今怎么也不明白，北伐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怎么也不明白，我们应该如何组织北伐？”<sup>⑥</sup>他于4月底返回广州后，应邀出席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他在会上发言反对立即进行北伐，建议首先稳定国民党内部，造成有利的政治环境，与冯玉祥国民军达成协议，尝试同孙传芳达成协议或者哪怕使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28—529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32—533页。

③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39页。

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79页。

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743、742页。

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33页。

他保持中立,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活动。<sup>①</sup>

通过对中国的实地考察,与苏联其他领导人不同,布勃诺夫认为进行北伐是理所应当的,根本无需争论,“因为整个军队和全体指挥人员都确信北伐是必要的,是迟早要进行的”。他说,北伐只是“时间和行动方式问题”,因为“华南的国民革命不能停滞不前”,所以“现在就要开始促使广州对吴佩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应为大量国民军北上做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同时他警告说:“不提出明确口号进行北伐,想不‘牵涉’农民群众而进行北伐,这就意味着绝对要犯错误。”<sup>②</sup>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4月1日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又专门重申以前坚决反对进行北伐的意见,申明“广州政府在目前这个时期应该坚决放弃进行进攻性军事远征的想法和那些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者走上军事干涉道路的行为”,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内部巩固上”。<sup>③</sup>可见,这同样符合“争取喘息时间”的策略。

在北京的加拉罕收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4月1日的决议后,于3日在回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中解释说:“广州不应提出占领新地区的目标,但它可能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这种扩张。”他举了湖南和江西的例子后,进一步强调说:广州的这种“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给以协助”。最后,加拉罕表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4月1日决定“不适用于我所提到的具体情况”。<sup>④</sup>

4月15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采纳斯大林提出的以中央名义给加拉罕的电报稿,再次重申了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广州军队不能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的指示,并严厉批评加拉罕“有绕开这个指示的企图”,要求其“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电报最后强调:“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sup>⑤</sup>

4月2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有维经斯基、罗易、福京等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会议决定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北伐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从政治角度来说,广州号召同北方作战会被解释为广州不愿意维护和保卫和平,而愿意打仗;从宣传角度来说,它会给工农群众留下很坏的印象,他们可能会认为共产党人是战争的预言者。<sup>⑥</sup>

5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重申对北

伐的反对态度后,作出了一个让步:认为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东的要道——湖南省”<sup>⑦</sup>。

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布勃诺夫使团的报告,“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sup>⑧</sup>

到了1926年初,华北、华中地区国民党地方党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纷纷致电或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这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力量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不仅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广州政权为国民党左派所掌握,而且,刚刚控制了广东邻省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一派也在2月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3月,国民政府通过两广统一方案,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同时,湖南军阀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唐生智也秘密派代表前往广州,表示倾向国民政府。后来他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些情况为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通过三二〇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行动,实现排挤共产党的目的之后,便开始把出兵北伐提上日程。这时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为摆脱矛盾并建立各自的地盘,扩展各自的势力,实现各自的目的,各派都企图借北伐之机向外发展。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顾问们“同样热烈地支持北伐的主张”,因为“北伐将把广州和全中国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正如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副团长拉兹贡在1926年4月25日

①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68、187页。

③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98页。

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01—202页。

⑤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02—203页。

⑥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28页。

⑦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41页。

⑧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67—268页。

的报告中所说：“必须扩大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因此准备进行北伐的工作应当提上我们军政工作的日程。”<sup>①</sup>

但是，到了1926年6月，“由于情报不灵，莫斯科对于国民革命军指挥机关打算在近期向北出动的意图毫无所知。”<sup>②</sup>不久，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迫使莫斯科容忍违背其意志开始进行北伐的这一既成事实。

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个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

7月23日，维经斯基在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他和加拉罕认为，北伐军“进一步向北推进会造成立军军阀势力聚集在孙传芳周围的危险”，所以，应当在湖北、湖南采取支持广州军队的方针，而在广州则有节制地行动，抑制进一步向北推进，把全部工作集中在巩固广州基地上。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后，建议中国委员会：“重新审议所谓北伐问题，搜集一切必要的材料，供政治局研究。责成鲍罗廷、加伦和维经斯基同志向政治局提交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广州在军事方面和一般政治方面的情况通报，并请国民党中央阐述其在所谓北伐问题上的动机和想法。”<sup>③</sup>

8月9日和16日，鲍罗廷在广州与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谈了对北伐及其政治前景的看法。他首先解释说：自己似乎一直是“北伐的反对者”。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要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他不能让蒋介石觉得他是北伐的反对者。所以，他在同蒋介石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申明，他认为像蒋介石所策划的这种北伐“是没有成功希望的事情”，但他还补充说，为了使北伐取得成功，他将给蒋介石“一切可能的支持”。

鲍罗廷的观点是：“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北伐的结果将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但是，他又说，不能直接地提出反对北伐的观点，因为“蒋介石本人在他对北伐的非革命的解中已把自己的命运同北伐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3月20日以后，来自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任何明确的和激烈的反蒋立场都会意味着‘三二

○事件’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演”。所以，对北伐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由于没有实力，不能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那么我们就只有等待和面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结束时等待着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而现在，关于北伐，“我们不该说任何话了”。可见，在鲍罗廷看来，对于实力强大的蒋介石和他所领导的北伐，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不能阐述任何意见，以防惹恼他们。能够做的，只有“等待”，即坐等北伐的结局。

鲍罗廷还对北伐的前景进行了预测。他认为，“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但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灭亡”。因为占领武昌后各路将领就会提出兑现承诺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求给一个省，可是占领的省份少于将领的数量。也就是说，从北伐军占领武昌的那一刻起将“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政治混乱”。这样，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如果蒋介石是占领武昌的那个集团的首领，那么其他力量就会纠集起来反对蒋介石，并一致进行斗争，蒋介石就会在这场斗争中遭到失败，“这也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灭亡的第一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在武昌召开广泛的国民党代表会议”。第二种情况是：蒋介石预见到在武昌的这种灭亡，现在就向唐生智等人作出让步，不去占领武昌，率一部分部队向江西进军，并急忙回师广州。这样只会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因为回师广州和不去打武昌，蒋介石就不得不宣告北伐失败。他的回师也就意味着北伐在政治上遭到失败，意味着重新审查蒋介石迄今所采取的整个政治立场，这会给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等“蒋介石所有对手”的发难造成极其有利的局面。而且，“蒋介石在看到自己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时，是能够向左转的，并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sup>④</sup>

根据鲍罗廷“有理有据”的估计，无论如何蒋介石北伐的最终结局是“政治失败”。但我们注意

<sup>①</sup>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25页。

<sup>②</sup> 参见[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397页。

<sup>③</sup>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67页。

<sup>④</sup> 以上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69—371、397、392页。



到,他只是试图通过对国民党上层军事派别的简单政治游戏和力量配置的分析,得出改变三二〇事件结局的可能性,却没有分析导致蒋介石在三二〇事件中得逞的社会政治因素。事实证明,鲍罗廷的预计是完全错误的。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8月22日,北伐军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境内。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

9月11日,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决定:“目前国民运动应当竭力避免与英国发生军事冲突”,“在占领武汉和湖北省以后,广州部队应停止继续向北进军”。<sup>①</sup> 远东局还建议广州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向张作霖及其盟友提出召开专门的和平会议。

9月23日,维经斯基在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中指出:“国内政治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是北伐今后的命运问题。”<sup>②</sup>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师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

11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广州目前向北挺进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是加剧奉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并使张作霖脱离奉天,哪怕以江苏中立为代价。鉴于此,建议鲍罗廷和加伦劝告国民政府“占领浙江并继续谨慎地向安徽推进,但不要同张宗昌发生武装冲突”,同时建议国民政府通过冯玉祥争取阎锡山转到国民政府方面来。<sup>③</sup>

很快,11月20日,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联席会议贯彻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8日有关中国问题的上述决定。会议在听取陈独秀关于《军事政治形势和国民政府的任务》的报告后认为,由于奉天反对冯玉祥的计划,目前的北伐可能不得不继续向北推进,因此必须:(1)争取冯玉祥同阎锡山达成协议,保证他在山西的督办地位;(2)不阻挠张宗昌占领江苏;(3)竭力争取尽快消灭孙传芳,占领浙江;(4)建议冯玉祥不要将自己的主力部队向东南方向调动,而要集中在包头,以便对付北方可能发动的攻势。<sup>④</sup>

直到1926年11月在江西战胜孙传芳之前,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以及陈独秀等

中共领导人都认为,考虑到国民革命军取得这些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有必要停止国民革命军继续向北和向东挺进。在北伐的问题上,他们对日新月异形势的评估,似乎总是慢半拍。

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总之,1926年北伐开始以前,尽管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顾问和布勃诺夫使团积极倡议和支持北伐,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广东的鲍罗廷、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海)远东局等却对北伐持否定态度。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突飞猛进的形势,迫使联共(布)、共产国际容忍违背其意志开始进行北伐的这一既成事实,并关注北伐事态的发展。但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及其代表,总是保守地估计北伐军的实力,多次提议北伐军保持现状,停止继续向北推进,其策略方针明显地落后于北伐形势的发展。当然,从总体上看,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北伐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这体现在武器装备的提供、政治工作的开展、北伐战略方针的制定等诸多方面。

综上所述,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主体的国民党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这其中,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和帮助,也有对中国革命不切实际的瞎指挥,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李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研究员、法学博士  
邮编:100080]  
[责任编辑:曹必宏]

<sup>①</sup>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430—431页。

<sup>②</sup>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539页。

<sup>③</sup>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627页。

<sup>④</sup>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628页。